新时代冷门绝学研究的探索与突破

史金波等

【编者按】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这组笔谈，旨在系统梳理新时代部分冷门绝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学科建设成就。笔谈汇聚该领域5位专家学者，立足文献整理刊刻、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范式革新、中外学术对话等多重维度，集中呈现新时代冷门绝学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深入剖析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进行前瞻性思考。各位专家学者坚守中国学术立场，深耕本土学术实践，传承中华历史文化根脉，积极回应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命题。从中可以看出，新时代冷门绝学研究的学科自觉显著提升，学科建设已迈向自主理论创新的新阶段。期待本组笔谈能够进一步推动学界关注冷门绝学的传承振兴，为夯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根基提供有益参考。

【关 键 词】冷门绝学　学科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　多元一体　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伟，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博士生导师；朝克，语言文化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明，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晏绍祥，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9-0040-41

西夏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新时代巨大发展

史金波

10—13 世纪的宋辽金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并立的阶段。元朝在修撰前代史书时，仅编纂《宋史》《辽史》《金史》，未为西夏修撰专史，导致西夏史料稀缺、史实模糊，后世遂有“神秘的西夏”之称。近代以来，大量西夏文献与文物相继出土，尤其是 1908—1909 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发掘，彻底改变了西夏史料匮乏的局面，推动了西夏学的形成与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西夏学的成就尤为突出，成为推动全球西夏研究发展的核心力量。

一、西夏学的形成与发展

西夏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彼时中国、苏联、日本的西夏研究均取得显著成果。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罗振玉等国学大师密切关注西夏新资料，纷纷参与西夏文献与文物研究并撰写著述，掀起第一波西夏研究热潮。1932—1933 年，王静如先生出版《西夏研究》第 1~3 辑，代表了当时西夏研究的最高水平。① 中国学者始终明确，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探索其历史、传承其文化遗产是中国学者的主体责任。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西夏研究突破单一的文字文献研究局限，逐步拓展至西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发展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西夏学由此与敦煌学、藏学、蒙古学并列，跻身国际显学行列。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是西夏研究的主要阵地，年事已高的王静如

① 参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 1~3 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2—1933 年版。

先生仍深耕西夏文献与文物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史金波、白滨则早在1976 年便赴西北六省区开展实地考察，搜集大量西夏研究一手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学者聚焦高难度、高学术价值的文献译释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对全面记载西夏文字形、字音、字义的韵书《文海》开展系统翻译与研究，于 1983 年出版《文海研究》，绝大多数西夏文字由此得到准确解释。[①] 1986 年，李范文出版《同音研究》，该书在《文海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夏字进行注音、释义，成为当时西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②] 2008 年，韩小忙出版《〈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对黑水城出土的《同音文海宝韵合编》进行全面校勘、整理与研究，贡献突出。[③]

通史类著作与传统史料整理同步推进。1979 年，钟侃、吴峰云、李范文合著的《西夏简史》出版；1980 年，吴天墀所著《西夏史稿》出版，该书是利用传统史料研究西夏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④] 韩荫晟耗费数十年心血，整理出版《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9 册），于 1983 年至 2000 年分阶段出齐。该书汇集党项与西夏相关史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⑤]

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 20 卷，今存 19 卷）是反映西夏社会状况的核心资料，对西夏社会各领域做出了细致的法律规定。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学者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用俄文翻译出版该法典，并刊布西夏文原文影印件。鉴于其重要学术价值，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耗时五年完成该法典的中文翻译，于 1994 年出版《西夏天盛律令》，后于 2000 年推出修订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⑥] 为学界提供了译本，推动相关研究大量涌现。

① 参见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参见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参见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参见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⑤ 参见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 参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西夏天盛律令》，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二、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西夏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承载者。中国学者坚守这一立场，确立了西夏研究的中国定位。这一理念历经数代传承，成为中国西夏研究的精神内核。针对西方部分学者将西夏归入“中亚”国家、割裂其与中国联系的错误观点，中国学者以扎实成果、严谨论证给予正面回应，筑牢了西夏学的中国根基。

（一）坚持学术主体性，锚定研究的中国定位

中国学者坚持学术主体性，立足中国本土开展西夏研究，进而阐释西夏文明内在的中华文明根脉，这是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西夏学界进一步界定研究范畴、明确价值导向，使西夏学成为阐释中国历史、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西夏学学术体系。新时代以来，西夏研究的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史金波发表的《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一文，从政治、文化、民族三个维度，结合大量史料，系统论证了西夏对中国的历史认同，清晰阐释了西夏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必然性。[①]

（二）主导资料建设，掌握文献出版主动权

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盗掘的文献占全球西夏出土文献的 90% 以上。这些文献因长期藏于俄国，仅有少量刊布，故严重制约了西夏学的发展。1993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下，民族研究所全程主导中俄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工程，统筹整理、拍摄、编纂、出版流程。1993—2000 年，中方先后 4 次组团赴俄，完成全部文献的高清拍摄、分类与校勘，最终将俄藏黑水城文献在中国出版。[②] 这一学术工程是西夏学资料建设的里程碑，同时催生了《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等出版项目，形成了中国

① 参见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03~115 页。

② 参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2025 年版。

主导的全球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体系，为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深耕各领域研究，取得原创性、体系化成果

中国学者全面深化各领域研究，取得了大量原创性、体系化成果，回应了学界关注的西夏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填补了西夏社会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

2005 年，由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出版，该书立足中国学者主导的文献整理与考古成果，构建了中国自主的西夏历史叙事与知识体系，成为西夏研究的标志性成果。[①] 2007 年，史金波出版《西夏社会》，该书是中国首部系统研究西夏社会的大型专著，利用西夏文原始文献、汉文史料与考古实物，还原了西夏多元一体的社会全貌，标志着中国西夏研究进入成熟阶段。[②]

三、新时代西夏学的重大进展

新时代以来，西夏学进入快速发展期，在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推动西夏学进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冷门绝学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研究核心领域，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格局。

（一）出版西夏文教材，完善学科教育体系

2013 年，史金波基于 50 余年科研与教学实践经验，出版《西夏文教程》，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翔实的西夏文教材，为培养西夏文专门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2020 年，该书被译为英文，由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成为中国西夏学首部外译的著作。[④] 2025 年，该书获评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教学奖（优秀教材），彰显了其学科教育价值。

① 参见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参见史金波：《西夏文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参见 Shi Jinbo, *Tangut Language and Manuscripts: An Introduction*, trans. Li Hansong, Leiden: Brill, 2020。

（二）持续深化专题研究，填补多项学术空白

新时代以来，西夏专题研究持续深入，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例如，2015 年，梁松涛出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该书系统整理、译注、研究西夏文医药文献，厘清了西夏医学与中原医学的渊源关系，同时填补了西夏学与中医文献学的空白；① 同年，孙伯君出版《西夏文献丛考》，该书围绕西夏文献、语言、音韵、佛经对音等方向展开专题研究，提出了诸多创见；②2017 年，彭向前所著《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书对俄藏黑水城所出连续 88 年古历书（现存最长古历谱）进行了系统整理、翻译和研究，填补了西夏历法文献整理的空白；③2025 年，李华瑞出版《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该书系统论证西夏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其中华基因，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重要启示。④

（三）破解西夏社会文书，还原西夏社会面貌

中国学者赴俄罗斯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发现了 1000 余号西夏社会文书，涵盖户籍、契约、账目、军籍等，学术价值巨大，但这些文书多为残页，并以西夏文草书书写，辨认难度极大。中国学者历经多年攻关，最终成功释读西夏社会文书，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在 2007 年《西夏社会》、2017 年《西夏经济文书研究》、2021 年《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等著作中，为揭示西夏社会、经济、军事状况提供了新资料、新认识。⑤

（四）整理汉文文献，提升研究整体水平

黑水城汉文文献数量众多、价值极高，但多为残页、残片，整理难度相

① 参见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② 参见孙伯君：《西夏文献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

③ 参见彭向前：《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④ 参见李华瑞：《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中华书局 2025 年版。

⑤ 参见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史金波：《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史金波：《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2021 年版。

当大。中国学者组织团队联合攻关，成果卓著：2008 年，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 册）出版，系统整理中国藏相关原始文献；2011 年，孙继民等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将相关研究提升至新水平；2016 年，杜建录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14 册）出版，对 4000 余件汉文文书逐一录文、校勘。① 此外，胡玉冰校注《西夏书事》等古籍，也为西夏文献整理作出新贡献。②

（五）出版《西夏通志》，填补纪传体专史空白

2025 年，杜建录主编的《西夏通志》（11 卷）出版，该书是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又一里程碑式成果，包括《西夏史纲》与《地理志》《经济志》《职官志》《军事志》《人物志》《部族志》《风俗志》《语言志》《文献志》《文物志》等分志，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西夏历史脉络、制度文化与社会面貌，弥补了元朝未为西夏修撰纪传体专史的缺憾。③

（六）西夏陵申遗成功，彰显西夏文明多元价值

考古专家对西夏陵进行了长期发掘与研究，厘清了陵园布局、陪葬墓规制、陵园建筑形制与水利系统，发现了大量碑文残片、瓷器、石雕、建筑构件等文物，并先后出版《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西夏六号陵》《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研究》等重要著作，为西夏陵申遗奠定了坚实基础。④ 2025 年 7 月 11 日，西夏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标志性遗产，向世界展示了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

① 参见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孙继民等：《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杜建录总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 年版。

② 参见吴广成撰，胡玉冰校注：《西夏书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版。

③ 参见杜建录主编：《西夏通志》，人民出版社 2025 年版。

④ 参见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著：《西夏六号陵》，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编：《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七）出版《西夏文物》，构建西夏物质文化谱系

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立项，该项目下设编纂《西夏文物》的子课题，由史金波任总主编。全书分为《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石窟编》《综合编》，共 35 册，至 2025 年全部出版。《西夏文物》通过全国联动、多学科协作、长期攻坚，系统构建起西夏文明的物质文化谱系，开了出版中国单一王朝文物全编的先河，为西夏陵申遗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支撑。这既是西夏研究的基石，也是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成果。①

（八）建设人才队伍，保障学科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建立西夏研究团队，开设西夏文、西夏史等相关课程，培养硕士、博士专业人才，推动形成了稳定的西夏研究学术梯队。2011—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宁夏大学先后举办 4 届西夏文研修班，参训学员累计逾 230 人次，培养了大批西夏研究后备人才。此外，国内每年举办各类国际性、全国性西夏学术研讨会及论坛，既推动了西夏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交流锻炼的平台，确保西夏研究后继有人、持续繁荣。

（九）普及西夏文化，推动学术成果大众化

中国学者积极与大众传媒合作，借助纪录片等形式，将专业的西夏历史文化知识推向社会，让西夏文化走进公众视野。2002 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科学纪录片《寻找西夏》；同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科学历程》栏目播出《西夏文字》2 集。2004 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连续播出 5 集电视纪录片《尘封不住的西夏》，提升了公众对西夏文化的关注度。2015 年，中央电视台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推出 10 集大型历史纪录片《神秘的西夏》。该片由史金波、李范文、陈育宁、杜建录等西夏学家担任顾问，多

① 参见史金波总主编：《西夏文物》，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4—2025 年版。其中，李进增主编《宁夏编》12 册，俄军主编《甘肃编》6 册，塔拉、李丽雅主编《内蒙古编》4 册，樊锦诗主编《石窟编》8 册，杜建录主编《综合编》5 册。

位西夏学家出镜解说，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西夏历史文化。同时，各地与西夏相关的博物馆不断推出文物展览，并通过开发文创产品等形式，推动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让西夏文物“活起来”，扩大了西夏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了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十）技术赋能研究，提升学科发展效能

西夏文输入法的开发与普及应用，解决了西夏文录入计算机的难题，方便了学者在著述中录入西夏文，为西夏文资料数据库建设和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学者研发出“西夏文语义输入法”，大幅提升了西夏文的录入效率，进一步推动了西夏文资料建设与西夏研究的数字化发展。

新时代以来，西夏学加强有组织科研，取得丰硕成果。在学术著作方面，西夏学界每年出版著作数十部，既有独立专著，也有“西夏研究”“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等系列丛书。其中，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的“西夏学文库”已集中出版西夏学著作 60 余种。在学术期刊方面，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夏研究》（季刊）、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主办的《西夏学》（半年刊）每年刊发论文 100 余篇，成为西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四、中国西夏学的光明前景

西夏学是一门国际化学问，国外专家在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等方面成果丰厚，为西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西夏在中国，西夏文化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学者在西夏研究中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主体责任。为更好地推动西夏学的发展，我们应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开拓新视域，取得新进展。

第一，继续夯实资料基础。目前有关西夏的传统文献已基本得到系统整理，近代出土文献绝大多数已整理出版，一部分重要西夏文文献已经译释，西夏文物也已系统普查并出版。今后可继续寻觅新的资料，进一步丰富资料基础，瞄准学术发展前沿，译释更多重要西夏文文献，同时注重利用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建设好西夏资料数据库，做好西夏文智能翻译系统的研发与利用。

第二，明确主攻方向。西夏研究要继续向阐释西夏历史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力，下实功，收实效；要重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证相结合，提升学术认知；要继续深入发掘西夏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新贡献；要特别注重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防止缺乏宏观考量的碎

片化倾向。

第三，攻坚克难，补足短板。西夏研究虽已有了大量成果，但仍有很多难点。例如，西夏语言还有一些未知现象没有破解，西夏文文献中还有不少重要世俗文献尚未译释，关于西夏文献与文物的专题研究还须深入，西夏学的综合研究、理论探讨更须加强等。西夏研究的难点往往也是学术创新的突破口。中国学者应发扬勇往直前、心无旁骛的治学精神，取得数量更多、水平更高的创新成就；要避免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取向，积极打造高质量、标志性的自主科研成果。

第四，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我们要着力培养既有学术志向，又在西夏学多领域具备精深业务能力，还能进行综合分析、理论探讨的人才，使之立足学术前沿，发挥推动和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此外，我们还要培养既有很强专业能力，又有突出科研组织才干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始终把良好的学风建设摆在第一位。

总之，中国西夏学当为弘扬西夏文化、守护这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尽责尽力，为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懈努力，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简牍学步入发展新阶段*

陈　伟

简牍学于 20 世纪初起步，至 20 世纪 70 年代渐入佳境，近十余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新发展。

一、简牍资料高质量密集出版

近十余年来，简牍学发展的最直观表现，就是著录专书的刊布远超以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梦睡虎地 77 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整理与研究”（16ZDA115）的阶段性成果。

蔚为大观。

战国简有李学勤、黄德宽相继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清华速度”大致每年出版 1 辑，自 2010 年至今已出版 15 辑；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第 1~3 辑（2019 年以来）；李天虹主编《湖北出土楚简五种》2 册（2024 年）。

秦简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里耶秦简》第 1~3 卷（2012 年以来）；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7 卷（2010—2022 年）；[①]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简牍》5 册（2023 年）；黄朴华主编《长沙坡子街秦代简牍》（2025 年）。

两汉简有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肩水金关汉简》5 卷 15 册（2011—2016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2012 年）；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7 册（2014 年初版，2024 年推出修订本）；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2016 年）；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地湾汉简》（2017 年）；张德芳、石明秀主编《玉门关汉简》（2019 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2020 年）；李志芳、李天虹主编《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2021 年）；彭浩主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天回医简整理组编著《天回医简》2 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南越木简》、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编著《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曹锦炎等主编《乌程汉简》（2022 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选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裴海霞编著《额济纳博物馆馆藏文物》（2023 年）；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4 卷（2024 年）；杨振红、邬文玲主编《天长纪庄汉墓木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随州周家寨汉墓简牍》（2025 年）；张春龙、杨先云主编《益阳兔子山九号井简牍》（2026 年）。陆续出版中的还有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 1~5 卷（2012—2015 年，其中第 1、4 卷于 2021 年修订重印）；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第 1~12 卷（2018 年以来）；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第 1~5 卷（2019 年以来）；山东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第 2~5 卷（2021 年以来）；陈伟、熊北生主编《睡虎地西汉简牍》第

① 《岳麓书院藏秦简》第 1~3 卷由朱汉民、陈松长主编，第 4~7 卷由陈松长主编。

1~2 卷（2023 年以来）。

三国两晋简有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9 卷 27 册（2003—2019 年），以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系列的收官之作《竹木牍》1 卷 3 册（2025 年）；郴州市博物馆编《郴州西晋简牍选粹》（2022 年）。

其中，肩水金关汉简（1973 年发掘）、江陵凤凰山汉简（1973—1976 年发掘）、张家山 336 号汉墓竹简（1985 年发掘）等，从发掘出土到整理刊布均历时 30 余年。这些简牍涉及汉代边塞制度、社会经济、律令体系等议题，学术价值重大，学界期盼已久。

此外，还有多种简牍再整理成果，如陈伟、彭浩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6 卷（2011—2024 年），张德芳主编《甘肃秦汉简牍集释》10 卷（2013—2020 年），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4 卷 6 册（2014 年）；在中国台湾地区，有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4 卷（2014—2017 年）。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简牍著录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利用高清数码相机和红外成像设备，获取常规相机难以捕捉的清晰字迹并予以刊布，极大便利了对简牍资料的释读与利用。李学勤谈及张家山 247 号墓汉简照片时说：“字形宛在而一团模糊，每每竭尽目力仍难确认。”① 今昔对比，技术条件进步明显。其二，从战国楚简文字到汉简草字，释读水平显著提升。其三，关注字迹风格、编痕契口、简背划痕、残损形态乃至埋藏时留下的污迹等简牍形态层面的信息，展开简牍缀合、编连、收卷的精细复原，有学者进而提出对竹书开展“微观考古”研究。② 由于理念、方法、技术的全面进步，简牍图像著录质量和整理成果的文本还原度普遍超越以往。

二、制度考察持续推进

层出不穷的简牍资料，有的可验证、补充传世文献，深化既有的史学认知；有的则基本未见于史载，从而开辟了全新的视域。有学者作出“史料结构变动”③ 的断语，尝试“重写”或“重估”秦汉史。这里试举几例，一窥简

① 李学勤：《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第 5 页。

② 参见贾连翔：《浅谈竹书形制现象对文字识读的影响——以清华简几处文字补释为例》，《出土文献》2020 年第 1 期，第 82~90 页。

③ 孙闻博：《简牍与秦汉史研究的“史料结构变动”》，《光明日报》2025 年 1 月 25 日。

牍资料对典章制度研究深化和拓展的助益。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统一措施，将“书同文字”与统一度量衡和“车同轨”并列。关于其内涵，早前学者或以为“正字形”，或以为“正用字”，也有学者主张二者兼有，但后者收效不彰。里耶 8–461 号木方用篆书记写几十条文字、用语方面的规定。[①] 陈侃理在辨识难字基础上，推断“A 如故，更 B”的句式指 A 在某些场合保持不变，而在某些场合变更为 B，意在根据不同的词义场合，区分原先混用的字。例如，“吏”“事”二字原先经常混用，“吏如故，更事”指“记录官吏之｛吏｝仍用‘吏’字，记录事务之｛事｝改用‘事’字”。[②] 这一观点为“书同文字”尤其是“正用字”提供了有力补充。田炜将木方中的用语规范一并纳入考量，进一步指出秦“书同文字”既包括废除六国古文、推行秦文字的内容，又对字形、用字、用语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是一个统一语言文字的综合政策。[③]

县级政府是秦汉国家的统治基础，关于其如何构建和运作，史载寥寥。里耶秦简作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文书，为相关研究带来突破性认识。在县廷，令史组成列曹，协助长吏工作；主要由官啬夫负责的诸官，主持各项具体事务。[④] 9–633“迁陵吏志”记明：“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縣（徭）使，今见五人。”[⑤] 就里耶秦简所见，哪些官署与这 10 位官啬夫对应，哪些属于“小官毋（无）啬夫者”，[⑥] 汉县又如何沿革，已可作细密论考。[⑦]

① 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5~157 页。

② 陈侃理：《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文物》2014 年第 9 期，第 78 页。

③ 参见田炜：《论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内涵及影响——兼论判断出土秦文献文本年代的重要标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本第 3 分，2018 年，第 403~450 页。

④ 参见郭洪伯：《稗官与诸曹——秦汉基层机构的部门设置》，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一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1~127 页；孙闻博：《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从〈洪范五行传〉一则佚文说起》，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 1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5~87 页。

⑤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2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7 页。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 页。

⑦ 参见孙闻博：《从乡啬夫到劝农掾：秦汉乡制的历史变迁》，《历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68~88 页；沈刚：《秦汉县级诸官的流变：以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讨论》，《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第 54~62 页。

秦汉时期的徭役是传统课题。在睡虎地秦简、张家山247号墓汉简出版后，相关讨论愈益热烈。随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刊布，又取得诸多创识：简牍中屡见“冗”与“更”同时出现，可见“冗”指长期供役，“更”指轮更供役。① 每次行徭的天数由徭事性质和工期决定，全年累计践更一个月，国家控制总量，县道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安排。② 根据岳麓秦简《徭律》可复原秦代徭役征发的具体程序：每年为每位徭徒制作徭券；发徭时乡啬夫、里典“以券行之”；每次徭事后，里典收齐徭券到乡署“券徭”，记下日期和类型；徭徒移徙，行徭记录移送到所徙之地；岁末更换新券，将需补偿或多出的行徭任务过录到新券上。③ 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显示，在“卒”（傅籍后的成年男性）中，减去“罢癃睆老卒”为“甲卒”，再减去“卒复除徭使”为“更卒”，表明更卒承担徭使，包含在甲卒之内。④

秦汉律令在旧史中颇有涉及，但语焉不详。睡虎地汉律、胡家草场汉律与兔子山律目彼此呼应，使至少自西汉惠帝至文帝几十年间的律典结构和性质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整体上分成两大部分——“狱律”与“旁律”，与《晋书·刑法志》所记“正律”“旁章”对应的情形类似。“旁律”均为“事律”，“狱律”以“罪名之制”诸篇为主，但也收入几篇“事律”，这种两分结构颇为特别。律典分卷、章两个层次。如果把章下的条考虑在内，也可以说是三个层次。文书简牍、奏谳书和张家山汉简《功令》所见对律令的持续校雠、活跃的法庭辩论、规范的奏谳程序，以及对司法官员的统一考试，使律典可以在不断修订中保持内容的相对确定和执行尺度的全国统一，并将最终解释权掌握在中央立法机构手中。⑤

① 参见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222页。

② 参见王彦辉：《秦汉时期的“更”与“徭”》，《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85~203页。

③ 参见陈伟：《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5~206页。

④ 参见王彦辉：《秦汉上计制度的考古学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1日；徐媛、晋文：《“笇卒”辨析：东牌楼东汉户籍简新探》，《中国农史》2023年第6期，第10~20页。

⑤ 参见张忠炜、张春龙：《汉律体系新论——以益阳兔子山遗址所出汉律律名木牍为中心》，《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第4~23页；陈伟：《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

三、书籍探研别开生面

文书簿籍以外，书籍是简牍文献的另一大类。近十余年来，新出、新刊的书籍简册相当丰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1）荆州夏家台 106 号楚墓和王家嘴 798 号楚墓出土《诗经》、安徽大学藏楚简《诗经》、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清华大学藏楚简“诗”类文献；（2）夏家台 106 号楚墓和荆州秦家嘴 1093 号楚墓出土《尚书·吕刑》、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3）王家嘴 798 号楚墓“乐”简、清华简《五音图》《乐风》；（4）王家嘴 798 号楚墓《孔子曰》、安大简《仲尼曰》、海昏侯墓《论语》；（5）秦家嘴 1093 号楚墓《四王五霸》、清华简《系年》，睡虎地汉简《质日》、胡家草场汉简《岁纪》、北京大学藏秦简《道里书》；（6）安大简《申徒狄见周公》、云梦郑家湖 274 号秦墓出土的《筮西问秦王》觚、张家山 336 号汉墓《盗跖》、北京大学藏汉简《仓颉篇》《老子》《赵正书》等；（7）秦家嘴 1093 号楚墓楚简“九九术”和里耶秦简“九九表”、清华简《算表》、岳麓秦简《数》和北大秦简《算书》、睡虎地汉简《算术》、胡家草场汉简《历日》《日至》；（8）里耶秦简中的病方、北大秦简《病方》、张家山 336 号墓汉简《彻谷食气》、胡家草场汉简《医杂方》，成都天回老官山 3 号汉墓出土的《脉书·上经》《脉书·下经》《发理》《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刺数》《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疗马书》《经脉》等医书。

这些书籍简册大幅扩充了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源，既增进了学者对当时知识体系的了解，也激发学者思考和切磋，促进了文献学、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

余嘉锡指出：“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① 这一从传世古书中提炼的通例，在简帛书籍中一再得到验证。不过，随着资料的积累，学者开始关注篇章的结集和整合，探讨大篇幅、多层次书籍的形成。余建平认为，结合传世和新近出土文献，可大体将中国早期古书的形成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其

系》，《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04~121 页。胡家草场汉简有“狱律”卷名，参见李志芳主编：《荆州胡家草场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97 页。

① 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13 页。

一，章按同类聚结的原则，以一定次序组合成篇；其二，篇按一定次序聚结成书。① 杨博强调“目”在书籍整合中的纽带作用，并揭示了干支式章次因容量有限而为数字系统取代的有趣现象。② 以往学界多将秦汉病方视为一个整体。田天发现秦病方是各种类型“方”的杂抄，其中包括家畜方、祝由方；而在西汉病方类古书中，家畜方、祝由方逐渐消失。西汉中期以后病方类古书的体例颇为一致，这种整齐的格式应与有组织的古书整理有关。③

宋人质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明清学者经过考订，普遍认为该书是伪书。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或以为该书不伪。刘光胜从用语习惯、字词演变、文意主旨、篇目差异、文体格制、历史背景等方面对比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厚父》《成人》与梅赜本《古文尚书》相关内容，说明后者系后世补辑之作。④

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与传世《尚书・金縢》颇见异同，李学勤认为二者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⑤ 裘锡圭进而分析说：“清华简的主人，显然并未受到儒家《诗》、《书》选本的影响……今传《尚书》、《诗经》属于儒家系统，清华简的《诗》、《书》则属于非儒家的流传系统。”⑥ 可见，简牍资料正在改变先秦文献传流系统的固有认知。

要之，新出简牍资料的大规模刊布，已从文本整理、制度考察、古书探研等层面推动相关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简牍学由此步入一个材料更丰富、方法更精细、视野更开阔的发展新阶段。

① 参见余建平：《出土文献视域下中国早期古书形成的主要特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5 期，第 62~73 页。

② 参见杨博：《出土简帛文献与早期典籍文本的生成》，《文学评论》2025 年第 2 期，第 193~202 页。

③ 参见田天：《秦汉病方类文本发展初探——基于北大秦简〈病方〉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2024 第 1 期，第 1~14 页。

④ 参见刘光胜：《〈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历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198~218 页。

⑤ 参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 年第 5 期，第 54 页。

⑥ 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 4 辑，中西书局 2013 年版，第 14 页。

满学学科发展与冷门绝学传承*

朝　克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各有关部门对古文字、历史文献和濒危语言文化的抢救保护、挖掘整理与分析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仍拨出可观的专项经费，培养古文字、历史文献和濒危语言文化方面的急需人才；同时，组建专家队伍开展相关搜集整理工作，其中就包括对清代历史文献的深入挖掘，以及对严重濒危的满语文的抢救保护。为推进这些工作，国家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开办培训班，培育清史与满学研究人才。尤为可贵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家拨出专项经费，从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招聘精通锡伯语和满语、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赴故宫博物院接受清史、满学（尤其是满语文）的系统培训，经过刻苦学习，他们很快成长为清代满文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主力。

在机构层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 1954 年设立明清史研究组，1966 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相继启动清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清史研究与严重濒危的满语文更加重视，满学学科建设也得到明显加强。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清史研究室；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1983 年，黑龙江省成立满语研究所，并于 1985 年创办专业性学术期刊《满语研究》。1991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也成立了满学研究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的 30 余年里，满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公开发表论文近 2000 篇，出版著作 300 余部，并推出一批整理与解读相关历史文献的成果。在以上成果中，还包括满语研究专著、满语自学教材和词典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满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升了中国满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与学术地位。

*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满文研究”（2025JX005）的阶段性成果。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冷门绝学研究事业，进一步强化优秀人才培育与专项课题资金投入。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任务，成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在这一重要讲话指引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于 2018 年设立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也于 2024 年启动“绝学”学科扶持计划项目。这些举措为包括满学在内的冷门绝学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冷门绝学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赓续文化血脉的学术使命。做好冷门绝学研究，要求我们认真挖掘、科学探索，从中汲取智慧，凝聚起推动学术发展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① 我们要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不断强化包括清代历史在内的中国历史研究，推进包括满语文在内的严重濒危语言文字研究；要通古今之变、发思想之先声，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外部因素；要以创新理论指导满学等冷门绝学的研究，坚持问题导向，从冷门绝学的角度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满学学科，系统回答清史研究和满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命题，科学阐释清代近三百年走过的曲折历史发展道路。

我们要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弘扬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 只有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才能不断开拓包括冷门绝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建立健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为加快满学学科的建设，满学研究应充分体现继承性、原创性与系统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性。继承性要求夯实文献根基。清代历史文化既是冷门绝学与满学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深入研究清代历史文化，就必须读懂清代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而要读懂这些文献，就必须掌握满语文。这要求我们持续强化对严重濒危的满语文的抢救保护工作。原创性要求取得标志性的高水平学术成果。满学研究应融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清代历史中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推动满学在知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系统性要求打破学科限制。满学研究应从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以及新兴交叉学科等多学科视角开展探索，通过跨学科协作推动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深入阐释清代历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科学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最终建立全面、系统、专业化的满学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

构建满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冷门绝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① 我们要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求真务实地融入冷门绝学研究中。对满学等冷门绝学而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也是实现学术理论独立自主、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性的必由之路。为落实这一任务，我们必须抓好学科建设：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冷门学科代有传承"② 的要求，重点培养满语文与满文文献整理人才，着力加强研究队伍建设，编写高水平教材，选定重大课题，打造精品科研成果，将满学建设成引领冷门绝学发展潮流的优势学科，从而夯实构建满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应立足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提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学术观点，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广泛参与满

①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学的国际学术对话，持续提升中国满学的国际影响力与学术话语权。

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①] 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做出“社科大要成为传承绝学、培养绝学优秀人才的重镇”[②] 重要部署。2024 年 11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与副院长彭金辉共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揭牌；同年 12 月 7 日，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召开学科建设研讨会暨成员聘任大会，明确研究院下设满学研究中心、简帛学研究中心、突厥学研究中心、亚述学与埃及学研究中心和古典学研究中心，其中满学研究中心由朝克担任主任。满学研究中心由此成为研究院框架下推进满学学科建设的执行主体，着力培养富有时代精神的冷门绝学专业后备人才。

改革开放后，中国满学不断走向辉煌，新时代以来更是取得了鼓舞人心的巨大成就。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不仅培养了一批满学中青年优秀人才，而且组建了老中青相结合的科研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满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对满学的高度重视，推动满学研究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满学研究中心成员在满学及相关领域深耕多年，学术积淀丰厚，曾出版《黑龙江现代满语研究》（2001 年）、《〈旧清语〉研究》（2002 年）、《现代满语口语及资料》（英文，2008 年）、《三家子满语语音研究》（2012 年）、《满语 366 句会话句》（2014 年）、《〈御制五体清文鉴〉研究》（2017 年）、《满学概论》（2020 年）、《俄藏满文文献总目提要》（2020 年）、《欧洲满文文献总目提要》（2021 年）、《满语构词法研究》（2023 年）、《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1997 年）、《满通古斯语及其文化》（日文，2002 年）、《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2014 年）、《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2014 年）、《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2014 年）、《满—通古斯诸语狩猎词研究》（2021 年）、《中国濒危民族语言文化研究》（2020 年）、《中国朝鲜语与满通古斯语高层论坛学术论文集》（2021 年）等著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满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主要取得了以下七方面成绩。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② 《牢记殷切嘱托 传承冷门绝学——加快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人才培养新高地》，《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总第 731 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其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指示精神，满学研究中心于 2025 年出版“满语文系列教材”，分为《满语研究》《清代满语言文字研究概论》《无圈点满文》《实用满语会话》《满文文献选读》五本。① 这套教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满语文教学与满学高端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于 2025 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冷门绝学研究重大成果。2025 年 4 月 1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举办“满语文系列教材”新书发布会暨新时代满学与满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满语文系列教材”的教学价值与学术创新价值。

其二，满学研究中心积极参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民族古文字识读研讨班”，组织国内外专家讲授清史与满学系列课程，并负责研讨班期间满学研讨会的主持工作。

其三，满学研究中心坚持科教融合，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优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教学平台，着力培养满学后备人才。自 2024 年以来，中心已招收多名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站科研人员，为其陆续开设“满语文”“清史概论”“濒危语言学”“满通古斯学”“满文历史档案选读”等课程，内容涵盖清代历史文化、满文文献、濒危语言文字，以及基础理论与前沿创新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满学教学体系。此外，中心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面向更广泛的学生群体开设“满语文”和“清代满文文献资料导读”等专业课程。

其四，满学研究中心多次邀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等满学研究重镇的著名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举办冷门绝学・满学系列学术讲座。

其五，满学研究中心自 2025 年起编印内部资料《满学研究通讯》，主要刊载国内外满学研究动态、学术活动、人才培养等内容。中心还建成满学与冷门绝学图书资料室，现藏图书两万余册，为满学研究和教学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

① 参见朝克、王敌非、乌日其木格:《满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朝克:《清代满语言文字研究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赵志强编著:《无圈点满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朝克、王敌非:《实用满语会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江桥编著:《满文文献选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

其六，满学研究中心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等先后召开多次中小型学术讨论会，就满文文献、满通古斯濒危语言文化等展开研讨。此外，中心成员还应邀赴京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满学、濒危语言文化等主题举办多场专题讲座。这些学术活动有力宣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满学等冷门绝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绩。

其七，满学研究中心目前承担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满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特殊学科项目“满通古斯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等一系列课题。此外，中心成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绝学新篇：“满语文系列教材”的编纂理念与学术价值》等文章；[①] 该报还刊发了《推动满学研究事业不断走向繁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满学研究中心主任朝克》访谈报道，[②]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发布满语文系列教材》等新闻报道。[③]

我们要在现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满学教材的编写出版；着力提升满学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理论；加强满学优秀人才培养，强化学科梯队与科研教学团队建设；提高对清代历史文献的学术研究能力，提升满学重大专项研究课题的理论水平，重点布局一批对清代历史文化与严重濒危的满语文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力争取得兼具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成果；增强中国特色满学学科体系的影响力，彰显满学作为冷门绝学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多措并举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推动满学与新兴交叉学科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支撑满学学科发展的专业资料库与数据库建设；积极与院内外、国内外满学专家学者开展更为广泛、深入、有效的学术合作，将满学研究中心建设成国内权威、国际知名的

① 参见朝克：《绝学新篇：“满语文系列教材”的编纂理念与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 年 12 月 30 日。

② 参见《推动满学研究事业不断走向繁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满学研究中心主任朝克》，《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总第 742 期，2025 年 2 月 18 日。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发布满语文系列教材》，《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院专刊》总第 760 期，2025 年 4 月 25 日。

学术平台，使之具有较为突出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

众所周知，冷门绝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赓续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建设文化强国意义重大。满学研究中心尚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关于满学建设的高标准战略部署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拼搏、砥砺前行。

玄奘在前：构建古印度文明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概观*

陈　明

古印度文明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古印度文明研究亦称“印度古典学”，与印度学、梵学、佛教学等关系紧密。中华文明与古印度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历史遗产。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是西域研究的巨著，其时空标识颇为精准，为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地理、宗教、习俗及人文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玄奘法师恪守“皆存实录，匪敢雕华”① 的写作原则，为中国的古印度文明研究树立了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典范。近年来，随着冷门绝学学科建设的深入开展，中国的古印度文明研究取得了整体性进展，正在逐步构建起中国自主的古印度文明研究知识体系。现将新时代相关研究的进展概述如下。

一、梵学人才队伍的持续建设

即便从 1917 年开设“印度哲学”课程算起，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也

*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古印度文明研究”（2026JX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12 页。

已走过100余年历程。自1919年起，雷兴（Ferdinand Lessing）、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等外籍学者相继在北京大学开设梵文课程。1946年，季羡林在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傅斯年等前辈支持下，创建了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为印度学学科的建制化奠定了基础。1960年、1984年、2005年，北京大学先后招收前三批梵巴专业本科生，培养了不少学有所成的梵学人才。北京大学的印度学学科既是中国早期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东方学建设和发展的标杆。2024年5月，北京大学举办“百年回眸：北大的印度学学科建设与中印人文交流展”，系统呈现了该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绩。

近年来，梵学人才队伍持续发展。一方面，北京大学培养的梵学人才与海外留学归来的梵巴语青年才俊进入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促使人才规模扩大，学科梯队逐渐成形，相关学术机构不断涌现。除了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外国文学所梵文与南亚文学研究室，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梵巴语教研室之外，复旦大学甘地与印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等机构也正积聚力量，推动古印度文明研究开枝散叶、形成新格局。另一方面，开设梵语及西域胡语课程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越来越多，除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宝生、郭良鋆、葛维钧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开办了为期三年半的梵语研习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梵学后备人才。此外，多位青年学者长期开设线上梵语课程，为社会公众了解佛教与印度宗教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尤为可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正筹备在“世界史”一级学科下自主增设“梵学”二级学科，有望赓续季羡林、黄宝生等前辈开启的冷门绝学文脉。在学术发表方面，新创办的《梵学》和《西藏贝叶经研究》（汉文、藏文）等刊物，为海内外学界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决定了学科的兴废。古印度文明研究作为冷门绝学，更需要薪火相传。

二、学术研究范畴的坚守与不断开拓

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古印度文明研究以坚实沉稳的步伐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的道路。

所谓守正就是坚持以原典语言为基础，以语文学研究为导向。印度梵文（与中国藏文对勘）或西域胡语写本的释读和刊布，始自钢和泰 1926 年出版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①] 钢氏还将梵、藏、汉本《圆满譬喻经》作为梵语阅读教材，其后林藜光将梵、藏、汉对勘方法运用于《诸法集要经》的校勘。季羡林不仅使用西域胡语写本讨论早期佛教语言问题，而且为中国的古印度文明研究做出了语文学角度的示范，其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对吐火罗语 A 方言《弥勒会见记》残卷的译释和研究。段晴从德国汉堡大学学成归国，充分发挥其语文学研究的特长，主持多个国家级重大课题，不断解读梵文和西域胡语（涉及于阗文、佉卢文、叙利亚文等）写本，出版《于阗·佛教·古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神话与仪式：破解古代于阗氍毹上的文明密码》等著作，[②] 引领北京大学梵巴语专业团队的发展，为中国的古印度文明研究增光添彩、鞠躬尽瘁。

近年来，学者接连释读出新字体的梵文写本（如西藏所藏《长阿含经》信度体写本），甚至是海内外的珍稀孤本，完成相关写本的转写、译释和研究，并梳理各语种写本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印度文明史与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揭示梵文写本的重要学术价值。相关代表性丛书主要有 3 套：其一，中西书局推出的“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 8 部专著；其二，中国藏学出版社推出的“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 28 卷；其三，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贝叶经特殊文本专项挖掘系

① 参见［爱沙尼亚］钢和泰：《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

② 参见段晴：《于阗·佛教·古卷》，中西书局 2013 年版；段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语卷（一）》，中西书局 2015 年版；段晴、才洛太：《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中西书局 2017 年版；段晴：《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西书局 2019 年版；段晴：《神话与仪式：破解古代于阗氍毹上的文明密码》，三联书店 2022 年版。

列”丛书。这 3 套丛书为海内外学界提供了主要来自西藏自治区的梵文贝叶经写本等新史料，不仅夯实了研究古印度宗教、文化和文明的多语种文献基础，而且推动了印度佛教文献、中印佛教关系史等冷门绝学领域研究的进展。除此之外，《禅定与苦修：关于佛陀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大方等大集经〉研究》《法称〈正理滴论〉与法上〈正理滴论注〉译注与研究》《月称〈明句论〉第一品译注与研究》《〈善见律毗婆沙〉研究》等著作亦备受关注。①

在上述研究进展背后，是中青年梵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具体而言，叶少勇释读的梵本写经包括《中论颂》、《中论佛护释》、《六十如理颂》（残叶）、《大乘庄严经论疏》、《顺正理论》（残叶）、《大哀经》、《大云经》、《瑜伽师地论释》、《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观心论》、陈那《正理门论》、《入正理论》等。罗鸿释读和校勘的布达拉宫收藏梵本主要有德光《律经》、无畏藏护《中观花蕾》、《〈现观庄严论〉清净疏》、宝藏寂《般若波罗蜜多优波提舍》等。罗鸿对《律经》梵文精校本的校勘和注释，以及对罗摩月《依缘月光疏》进行的多语种（梵、藏、蒙）文本的比较研究等，深化了学界对佛教戒律文本的跨文化传播与印度晚期佛教哲学的认识。刘震释读和研究梵本《弥勒下生成佛经》、《赞法界颂》与《长阿含经·修身经》，以及波斯文《弥勒授记经》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吠陀文献的译释及研究”，并出版《〈梨俱吠陀〉选译》，② 还对福建泉州出土的泰米尔文、汉文双语碑铭与云南大理梵文碑铭等史料加以考释。吴娟开展梵、藏、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衣事》等佛律的对勘研究，以及佛教与耆那教故事文献的比较研究。朱成明出版了《利论》的全译校注本。③ 徐美德完成吉尔吉特梵本《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大正藏·胎藏梵字真言》、《义足经》（巴、汉文献比较）、吉尔吉特梵本《大会经》的整理研究。

① 参见刘震：《禅定与苦修：关于佛陀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年版（初版于 2010 年）；萨尔吉：《〈大方等大集经〉研究》，中西书局 2019 年版；王俊淇：《法称〈正理滴论〉与法上〈正理滴论注〉译注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王俊淇：《月称〈明句论〉第一品译注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吴蔚琳：《〈善见律毗婆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

② 参见刘震：《〈梨俱吠陀〉选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2023 年版。

③ 参见［古印度］憍底利耶著，朱成明译注：《利论》，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

此外，何欢欢深研梵本《中观心论》及其古注《思择焰》；周利群释读牛津大学藏中亚梵本《虎耳譬喻经》；王俊淇研究新发现的《大日经》梵文写本；张梦妍刊布新出梵本《八大灵塔礼拜赞颂》与梵文碑铭“缘起法颂”；范晶晶考释西安沣西出土荆思泰本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的文献价值与仪式用途；陈瑞翾辨识出粟特文残卷《究竟大悲经》；常蕾转写尼泊尔藏梵文贝叶《十地经·欢喜地》；普仓整理《宝鬘论颂》校勘本，辨识信度体的《长阿含》、《法句经》与《福力太子本生》写本；扎西本辨识西藏梵文贝叶经《阿摩罗词典》与《阿摩罗词典释疏》；达娃群宗释读梵本《观自在（菩萨）赞》《五字文殊怙主供养仪轨》《出世间赞》等；李灿整理研读《首楞严三昧经》梵、藏、汉、于阗四语文本，并通过多语种文本对比，比定出早已佚失的鸠摩罗什本《贤劫经》残片。

所谓创新就是学术研究范畴的扩展。从以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中心，拓展至一个更为广阔的古印度文明知识谱系，将玄奘法师所谓“五明大论”整体囊括在内。除作为传统研究领域的宗教学（内明：佛教；外道：印度教 / 婆罗门教、耆那教研究等），以及为各领域研究提供支撑的语文学（梵文写本、西域胡语文献研究等），该知识谱系涉及的现代学科范畴还包括：语言学（声明：梵语语法学、梵汉佛经对勘、梵汉对音研究等）、文学（梵文古典文学、印度古典诗学、出土文献与中印文学交流史、文学与图像研究等）、医学史（医方明：生命吠陀、佛教医学、丝绸之路医学文化交流史研究等）、科技史（工巧明：印度天文学史、占星术、建筑学史研究等）、考古学（印度出土文物、石窟寺研究等）、逻辑学（因明）、艺术史（印度文学图像、宗教图像、插图本、壁画、雕刻研究等）。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季羡林关于早期佛经语法研究等问题的论文结集于《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等专书中，金克木《印度文化论集》也关注梵语语法问题，饶宗颐《梵学集》、王邦维《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与周广荣《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同样讨论了与梵语相关的悉昙之学。[①] 在前辈的引领下，以段晴《波

① 参见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季羡林：《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东初出版社 1995 年版；金克木：《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饶宗颐：《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王邦维：《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周广荣：《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版。

你尼语法入门》出版为契机，[①] 梵语语法等研究渐入佳境。周利群、黄冠理编写的《梵语综合教程·第一册》是第一部面向中文背景学习者的梵语语法入门教材，兼具专业性和趣味性。该教材打破了国内长期依赖海外梵语语法教材的局面，契合立足本土开展教学与研究的实际需求，为探索梵语教学新模式创造了条件。[②] 徐美德的《吠陀梵语语法：语音、变格及变位》（译著）是研读吠陀文献的重要参考书。[③] 新近成果还包括《藏译声明文献研究：学派、作品及传播》《梵文语法理论在西藏的流传史研究》等著作，[④] 以及北京大学多篇研究梵语语法著作的博士学位论文。

在黄宝生、朱庆之、段晴、万金川、辛岛静志等学者的推动下，梵汉佛经对勘、汉译佛经词汇与语法、梵汉对音研究正形成新的学术气象。黄宝生带领的团队编写了一系列梵语、巴利语教材，如《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梵语入门》和梵汉对照读本《罗怙世系》，[⑤] 以及《巴利语读本》与《实用巴利语语法》（译著），[⑥] 为完善梵巴语教学体系作出重要贡献。黄宝生还主持出版了“梵汉佛经对勘”丛书，[⑦] 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梵学领域的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优势。该丛书对理解古印度文明、深化中印文明互鉴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均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同时，以梵汉对勘方法开展佛经词汇与语法研究尤其值得关注。王继红、陈秀兰、李博寒、姜南、范慕尤、卢鹭等新生代学者积极开拓进取，相关学术成果在新时

① 参见段晴：《波你尼语法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参见周利群、黄冠理：《梵语综合教程·第一册》，中西书局 2025 年版。

③ 参见［英］麦克唐纳：《吠陀梵语语法：语音、变格及变位》，徐美德译，中西书局 2024 年版。

④ 参见才让扎西：《藏译声明文献研究：学派、作品及传播》，甘肃民族出版社 2025 年版；边贵：《梵文语法理论在西藏的流传史研究》，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26 年版。

⑤ 参见黄宝生编著：《梵语文学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黄宝生主编：《梵语佛经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郭良鋆、葛维钧：《梵语入门》，中西书局 2016 年版；［古印度］迦梨陀裟著、黄宝生译注：《罗怙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⑥ 参见黄宝生：《巴利语读本》，中西书局 2014 年版；［法］迪罗塞乐：《实用巴利语语法》，黄宝生译，中西书局 2014 年版。

⑦ 黄宝生另有待出版遗著《梵汉对勘〈维摩诘经〉》（增订本）与《梵汉对勘〈入法界品〉》。

代不断涌现。①

在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方面，继季羡林、金克木陆续将梵语原典《五卷书》《云使》《罗摩衍那》等译介为中文后，黄宝生不仅领衔完成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全译，而且其牵头的“梵语文学译丛”已出版 20 余种，包括名著《十王子传》《鸠摩罗出世》《故事海》等，是国内学界迄今最为系统的古典梵语文学译介成果，为认识古代印度文学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文本。此外，陈明、侯传文、范晶晶等亦努力推进中印文学交流史的研究。②

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以金克木《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译著），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梵语诗学论著汇编》（译著）、《梵汉诗学比较》，郁龙余等《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为前导，③ 尹锡南先后出版了《印度文论史》、《印度诗学导论》、《印度古典文艺理论选译》（译著）、《舞论》（译著）等著作，有力推进了印度古代诗学的研究。④ 陈明、湛如分别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和“印度古典梵语文艺学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组织青年学者对 10 余种古典梵语文艺学经典（含诗学专著、画论、工巧及舞论著作、往世书等）进行翻译和研究，出版“古代东方美术理论选萃”丛书。这些工作有助于在中国学界建立具有理论创新意

① 参见王继红：《基于梵汉对勘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语法研究》，中西书局 2014 年版；陈秀兰：《基于梵汉对勘的魏晋南北朝佛经词汇语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陈明：《梵汉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词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李博寒：《基于梵汉对勘的〈无量寿经〉语法研究》，中西书局 2023 年版；姜南：《梵汉对勘与中古译经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年版；范慕尤：《预流之学：佛教文献对勘研究》，中西书局 2025 年版；卢鹭：《早期译经中的重复翻译现象——以安世高译经为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5 年第 3 期，第 9~20 页。

② 参见陈明：《印度佛教神话：书写与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 年版；侯传文：《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中华书局 2018 年版；范晶晶：《缘起：佛教譬喻文学的流变》，中西书局 2020 年版；陈明：《丝路梵华：出土文献所见中印文学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

③ 参见《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金克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梵语诗学论著汇编》，黄宝生译，昆仑出版社 2008 年版；黄宝生：《梵汉诗学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郁龙余等：《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昆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④ 参见尹锡南：《印度文论史》，巴蜀书社 2015 年版；尹锡南：《印度诗学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印度］宾伽罗等：《印度古典文艺理论选译》，尹锡南译，巴蜀书社 2017 年版；［古印度］婆罗多：《舞论》，尹锡南译，巴蜀书社 2021 年版。

义的古代印度文艺学知识谱系，深化中印传统审美理论交流与互鉴。

印度古代史研究总体仍偏冷，张远释读梵语铭文、波那《戒日王传》、梵剧《龙喜记》等史料，通过文史互证，勾勒出戒日王统治的历史全貌。[①] 相比之下，医学史研究已从零星关注发展到专题聚焦，对生命吠陀、佛教医学、丝绸之路医学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探索不断深入。以著作《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为起点，[②] 陈明不仅翻译了印度梵文医籍《医理精华》、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对照医方集《耆婆书》以及《鲍威尔写本》中的三部梵文医学写卷，而且考察了不同医学传统在丝绸之路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互动。陈明的系列著作还包括《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丝路医明》《天竺大医：耆婆与〈耆婆书〉》等，[③] 揭示了长时段、大范围的古代欧亚丝路医学文化交流史的复杂性。新近的相关著作有《吐鲁番医学文书辑校注译与交流互鉴研究》等。[④] 科技史研究近年来聚焦天文学史、数学史、建筑学史等领域，代表性著作有《西去东来：沿丝绸之路数学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虎耳譬喻经〉文本与研究：中印间天文、历法和文学的交流》等，[⑤] 这些成果有效拓展了古印度文明研究的跨学科维度。在考古学研究方面，李崇峰的《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李翎主编的四卷本著作《印度佛教石窟寺》等为丰富古印度石窟寺与多元宗教研究提供了中国学者的视角。[⑥]

三、学术自主观念的主动变革

长期以来，印度学、佛教学遵循的是西方学术规范，使用的是西方学术

① 参见张远：《戒日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 参见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版；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③ 参见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陈明：《丝路医明》，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陈明：《天竺大医：耆婆与〈耆婆书〉》，广东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

④ 参见王兴伊、石舒尹：《吐鲁番医学文书辑校注译与交流互鉴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 年版。

⑤ 参见纪志刚、郭园园、吕鹏：《西去东来：沿丝绸之路数学知识的传播与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周利群：《〈虎耳譬喻经〉文本与研究：中印间天文、历法和文学的交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⑥ 参见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李翎主编：《印度佛教石窟寺》，中西书局 2024 年版。

话语和评价体系，偏重印度梵文文献的价值，强调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学者甚至坚持认为，中印古代文明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单向学习印度”的过程。该观点看似只是一种强调主次关系的历史判断，并未直接否定双向互动，但实际上既忽视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在古印度留下的点滴印记，也没有深入体察中国文化在接受印度佛教过程中的高度能动性，尤其是对印度佛教的改造与变革。文明交流具有双向性，古代中印之间也不例外：印度佛教流传于中国，固然毋庸置疑，但中国文化同样在印度产生了影响，不能因为印度缺乏相关史料记载就否定这一事实。季羡林从解读有关天竺制糖术的敦煌残卷（P.3303）中的关键词“煞割令”（śarkarā，砂糖）出发，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著作《蔗糖史》，① 为探讨中印文明交流的双向性树立了研究典范。作为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古印度文明研究的领军学者，王邦维以唐代求法高僧义净的著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传世和出土汉文史料，通过多语种文献对勘和文本、文物的对证，进行细致周密的校注与深入的分析，解决了印度部派佛教史和中印佛教及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诸多难题。② 2025 年，因在以唐代赴印求法僧为重要内容的中印文化交流、中外跨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王邦维荣获法兰西金石与美文学院颁发的“汪德迈中国学奖”，为中国的古印度文明研究赢得了国际盛誉。经过新时代的持续努力，中国的古印度文明研究逐渐形成了自主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

其一，以我为主，坚持双向交流的理念，破除单向性的迷思。在语言和文本层面，须强调梵、巴、藏、汉并重，坚持翻译与研究并行。解读古代印度佛教典籍不能单纯依赖梵文佛经，还要以相对应的巴利文、藏文和汉文佛经为参照，尤其是不能忽视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汉译佛经，以及丝绸之路沿线遗址出土的相关写本。对早期汉译佛经在文本转译、词汇对应、文化理解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应予以充分的重视。与中古汉语史相关的梵汉对勘研究，也应在注重印度原典（梵语、俗语）的同时，大力发掘汉译佛经的多重价值。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学者以梵汉对勘研究为基础，充分利用新近刊布的以梵文为主的非汉文佛经写本材料，对比解读佛经词语的含义，分析佛经翻译中语言转换的特征和新的语法现象，从而极大拓展了汉译佛经文本与语言研究

① 参见季羡林：《蔗糖史》，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参见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 1988 年版；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王邦维：《交流与互鉴：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论集》，香港三联书店 2018 年版。

的格局，也使基于梵汉对勘的佛经语言研究成为当前最具中国学术色彩的新学科分支之一。

其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五文并举”的方式，即坚持学习文字、细读文本、感悟文学、体证文化、传承文明，揭示古印度文明与古代中印文明交流的真实概貌；坚持“五重证据法”，即综合运用中土传世典籍（以印本为主）、丝绸之路出土文献（汉译佛经及注疏、求法行记、史地文献等抄本）、域外文献（印度本土文献或西亚、欧洲等“他者”描述印度的典籍）、考古文物（以南亚出土古代文物为主）、图像史料（以壁画、石刻、插图本、地图等为主）等五类证据，强调文本与图像并重，开拓印度古典文学、宗教与相关图像的研究新领域。

其三，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与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古印度文明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现阶段国内学者越来越注重对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综合考察。在精神文化层面，学者开始将佛教置于古代印度文化整体框架和全球史视野下，不仅讨论印度佛教的义理、部派、经典（原典与注疏）、仪轨、法师及其传承、政教关系、僧官组织、寺庙建筑、法器使用、社会慈善、经文翻译与改写、艺术塑造等，而且分析佛教与其他宗教（印度教、耆那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竞争、兴衰乃至部分融合的历史过程。在物质文化层面，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瓷器、制糖术与榨糖器械、皮革、药草、香料、铁器、艺术品、船舶与造船技术、货币流通、港口与城市建设、使臣与商人（及其家族）等，展现了中印双向的物质交流图景，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习俗形成和改易的过程。

当前，学界已普遍认识到古代中印之间的文明交流内容丰富，其中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而那些隐藏在文字或图像背后的历史，正是需要我们去发掘和探索的。要逐步破除以往受制于西方汉学与印度学既定框架和阐释系统的局面，建立中国自主的学术范式，就必须以长时段的视野，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充分考察。对古印度文明的认识不能局限在印度内部，还必须将之放到更广阔的周边甚至全球视域中加以理解；而古代中印之间的互动，亦与周边多个文化区域存在关联。因此，对古代中印文明交流的研究，应从双边关系（中—印）扩展到多边关系（中—印—波斯 / 阿拉伯—东南亚）乃至全球网络（中—印—全球）。只有坚持中印双向交流的研究思路，充分利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南亚史料和中国出土的与南亚相关的文物（包括水下考古发现），在跨语言、跨媒介、跨学科、跨文化、长时段的全球史视野下开展

冷门绝学研究，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自主的古印度文明研究知识体系。以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古印度文明研究”的实施为契机，持续开展对古印度文明的深入研究，也是服务国家战略、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学术使命。任重道远，吾辈自当扎实奋斗，不断向前迈进！

西方古典学的中国视角 *

晏绍祥

作为一门冷门绝学，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始终立足本土学术传统与时代关切，其发展过程清晰地展现了从运用古典资料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转变。

一、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根据内维里·莫利（Neville Morley）的定义，西方古典学是“关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文化及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研究”。① 较之文艺复兴时代甚至 20 世纪初，这一西方古典学概念已被拓宽，因为莫利明确地将古代西亚与埃及纳入其中。然而，在许多欧美大学的学科设置中，西方古典学事实上仅指研究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学问。古代西亚与埃及之所以被纳入西方古典学范畴，可能是因为古希腊罗马世界从那两个古老文明汲取了太多营养，以至于无法将它们简单地视为外来文明。因此，《剑桥古代史》的编写者将古代西亚与埃及作为西方古代史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在学科设置上，古代西亚与埃及研究通常仍归入东方学，分别称为“亚述学”和“埃及学”。至于古代中国和印度，除了偶尔因与古希腊罗马世界发生联系而被提及，基本被排除在西

* 本文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西方古典学”（2024JX00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外文明传承与交流研究中心”资助。

① ［英］内维里·莫利：《古典学为什么重要》，曾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 页。

方古典学之外。

然而，中国与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联系很早就已建立。当张骞为联系大月氏出使中亚时，当地可能仍存在若干希腊人建立的政权。丝绸之路开通后，希腊艺术风格逐渐传入中国。东汉时期，据称为罗马使节的人士两度抵达洛阳。尽管这些人的身份、动机和行程仍有许多不明确之处，但中国与古希腊罗马世界之间早已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联系，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历代文献常有关于古希腊罗马及其后继者拜占庭的记载，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哲学、医学与宗教，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明末，随着新航路开辟和传教士东来，部分希腊拉丁文献和古典知识陆续被译介到中国。不过，直到 20 世纪前期，中国大学仍缺乏必要的古典教育，西方古典学研究也尚未提上日程。

新中国的成立为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条件。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无西方古典学专业，但古希腊罗马历史、哲学、文学在“世界历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外国教育史”“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中均有讲授。为配合教学需要，学者们还编写了相关教材和参考资料。以古希腊罗马史而论，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恺撒（Caesar）和塔西佗（Tacitus）的部分作品都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译成中文，《罗马共和国时期（上、下）》等专题性资料集也作为“世界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出版。[①] 这些课程、教材和参考资料，为新中国第一代西方古典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此外，部分学者还被派往苏联学习，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方古典学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最初以历史为重心。当时历史研究的核心关切是证明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奴隶社会，以此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在这一认识主导下，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被认为带有鲜明的奴隶制烙印。循此逻辑，古希腊罗马文学史、政治思想史、教育史等具体领域的研究，也基本被纳入奴隶制的分析框架之中。

改革开放为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彼时中国渴望发掘中西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与共性，故历史研究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尤以中西比较研究最为活跃。这方面最初的代表性学者是顾准和林志纯。

① 参见任炳湘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上）》，三联书店 1957 年版；任炳湘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和一系列文章中，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推崇古希腊城邦，进而强调中西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在顾准看来，古希腊城邦虽在外表上与春秋时期及其之前中国的小国相似，但二者的政治体制存在根本不同：中国诸小国之上始终有最高政治权威，后经兼并走向大一统；古希腊城邦之上不存在最高政治权威，长期保持自治。① 与顾准相反，林志纯更加关注古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他将古代文明世界划分为“古代欧洲”“古代北非西亚（伊朗）南亚中亚”“古代中国”三大部分，并据此归纳出中国与西方两大古典文明系统；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古典文明又可以划分为古典城邦与古典帝国两个阶段。② 他认为，城邦均由原始社会后期的氏族部落发展而来，都实行民主政治或共和政治，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的邦。③

顾准和林志纯的研究具有两方面创新意义。一是将古典学扩展为研究整个古代世界文明的学问，不再像西方的古典学那样局限于古希腊罗马研究，至多涉及古代西亚与埃及。在顾准的体系中，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古典文明的比较对象；在林志纯那里，不仅中国古典与西方古典双峰并峙，而且中国、印度乃至美洲的古代文明都被纳入古典学范畴，从而大大扩展了古典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体现了独特的中国视野。二是对古典时代历史的重新界定。在林志纯看来，古典历史包括古典城邦和古典帝国两个阶段。古典城邦必然是民主或共和的。古典帝国是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城邦制度解体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都实行君主专制。因此，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并不成立。林志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断可能值得商榷，但其学术贡献正如黄洋所论：“他的研究一方面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学界盛行的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也从学术上质疑了只有希腊罗马存在城邦形态这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取向的看法。”④

顾准和林志纯的上述论断长期影响着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胡钟达、刘家和、马克垚、施治生等的研究无不围绕城邦、帝国及其治理模式展开，

① 参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11 页。

② 参见日知（林志纯）：《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12、16、37 页。

③ 参见日知（林志纯）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60 页。

④ 黄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意义与路径》，张巍主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指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55 页。

在古代世界的民主与共和、等级与阶级、王权与专制主义，以及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与制度等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实在的进展，[①] 为新时代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新时代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人才培养是西方古典学研究发展的基本前提，林志纯是最早致力于这一工作的学者。早在 1985 年，他就与周谷城、吴于廑联合发表文章，呼吁填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的空白，强调语言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②] 在此前一年，他已在东北师范大学主持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该所举办世界古典文明试办班，选拔相关高校高年级本科生入班，同时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聘外国专家，教授西亚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各种古代文字。该所注重培养能够直接运用古代文字和一手文献的古典文明史研究者，力图将中国古典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古典语言与史料基础上；建所 40 余年来，已培养了大量人才。当前活跃在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一线的学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毕业于或受益于该所。林志纯倡导的打好语言教育基础的主张，如今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2009 年，在甘阳主持下，中山大学组建博雅学院，招收本科生。该院的主要特点是：学生在入学前两年集中接受通识教育，以核心文本与课程为中心，意在让学生通过直接阅读经典文本，获取对人文学科原初的、鲜活的体认，初步形成古今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后两年学生可分别选择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汉语言文学等专业，接受专业教育。2020 年，中国人民大学依托国学院设立国学 – 古典学实验班；2024 年，教育部新增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人大国学院于同年招收该专业首批本科生。国学 – 古典学实验班的学习内容不仅包括十三经、前四史等中国传统经典，还广泛涉及西方古典学，涵盖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语言文字，以及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原典等，其目标也是从语言和原典入手，立足中国古典，培养具有良好语言基础、能

① 关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西比较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参见晏绍祥：《中国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1949—2020）》，张巍主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指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76~314 页。

② 参见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历史》1985 年第 11 期，第 1~3 页。

够会通中西的人才。这种以中国古典为根基的培养取向，体现了中国古典学教育的学术自觉。

新时代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呈现一系列新特点。因笔者对古希腊罗马史相对熟悉，故这里以相关研究为中心稍加评述。

其一，资料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各研究单位的藏书量大幅增加。除了流行的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牛津古典文献（Oxford Classical Texts）、托伊布纳丛书（Bibliotheca Teubneriana）、布代丛书（Collection Budé）等更加专业的古典文献丛书也被很多图书馆收藏。《希腊历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FGrHist）、《希腊铭文集成》（Inscriptiones Graecae, IG）、《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IL）等重要资料集亦进入不少图书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电子数据库的普及，学者们如今可以方便地获取重要的考古报告和最新的研究论著，这使资料获取不再如 20 世纪那样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最大的阻碍。同时，更多的古典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不乏从原文直接译出者。色诺芬（Xenophon）的部分著作、《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选本）、希腊抒情诗（选本）、罗马戏剧（选本）、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通史》、狄奥多鲁斯（Diodorus）的《历史集成》（中译本名为《希腊史纲》）、盖利乌斯（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斯巴提亚努斯（Spartianus）等的《罗马君王传》、西塞罗（Cicero）的大部分著作等，如今都有了中文版本。此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罗马法民法大全翻译系列”丛书，吉林出版集团推出了“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丛书。学者们还着手编纂不同规模和版本的资料集，并出版西方学者整理的部分资料。这些工作虽不够系统，但汇集起来已蔚为大观，既丰富了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本土资源，也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新起点。①

其二，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20 世纪的学者主要关注国家和文明起源、社会性质、经济状况、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政治等问题，新时代的研究则向更宽广的领域拓展。

在古希腊史领域，研究早期希腊（如爱琴文明、荷马社会和东方化时代）

① 李剑鸣指出，欧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得益于雄厚的本土资源。这些资源除了丰厚的史学传统与社会科学理论，还有资料方面的积累。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发展，无疑也得益于类似的资料积累工作。参见李剑鸣：《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第 52~60 页。

的专著相继问世。关于古典时代，一方面，雅典民主政治继续受到关注，《希腊古风诗教考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政治文化视角的深描》等重要著作陆续出版；[①] 另一方面，学者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民主政治，对寡头政体、僭主政体，希腊人的族群认同、疆域观、帝国观与宇宙观，以及钱币、演说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等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学界对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交流的关注度显著提升，连接希腊世界与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成为研究热点，代表性成果如多卷本著作《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②]

在古罗马史领域，共和国史继续受到关注，新近出版的相关著作如《罗马内战研究》。[③] 原先一直被忽视的罗马帝国史研究也取得明显进展，涌现了一些重要著作，如《维吉尔史诗中的历史与政治》。[④] 不仅如此，学者对帝国疆域观念与元首权力合法性、庞贝政治生活、行省治理、西部行省城市捐助人、晚期罗马时代史学观念的转变、古代至中世纪过渡期政治思想的变化等问题也均有论及。这些研究大多以一手文献（包括新近发现的铭文）为基础，体现出学者良好的史学和古典学素养。古罗马社会生活史、妇女史、法律史、文化史、政治制度史等新领域亦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代表性著作如《古罗马社会生活研究》《罗马公法要论》。[⑤]

其三，作为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中最具特色的领域，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西比较研究在新时代不断走向深入。一方面，刘家和、马克垚等前辈学者继续在中西比较研究领域深耕，接连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中青年学者陆续加入，开拓了中西比较研究的新维度。

刘家和的中西比较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是对世界史体系的思考，二是中西思想史比较。他在新时代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史入手，解释统一何以成为中国一直追求的目标。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传承与创新的融合，在史学上的突

① 参见张巍：《希腊古风诗教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晏绍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李尚君：《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政治文化视角的深描》，商务印书馆 2023 年版。

② 参见杨巨平总主编：《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中华书局 2024 年版。

③ 参见杨俊明：《罗马内战研究》，商务印书馆 2025 年版。

④ 参见高峰枫：《维吉尔史诗中的历史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⑤ 参见裔昭印：《古罗马社会生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6 年版；徐国栋：《罗马公法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出表现是通史传统，尤其是前后的贯通和联结。① 这种观念在周公旦有关殷亡周兴的思考中已有所体现，经过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更替，天人关系几度调整，最终在汉代形成以三代、三统和天人合一理论为代表的历史理性。就此而言，中国通史传统的“通”并非西方“普世史”意义上的“通”，而一如文明传承，“既是中国史学体例的一种表现也是史学精神的一种展现；如果推展而言，这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种在精神上的反映”。② 刘家和与刘林海有关 3—6 世纪中西历史发展道路的比较，关注的也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他们从政治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的统一和文明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动荡之后仍能延续，以及西方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政治长期分裂、文明出现一定程度断层的原因。③

马克垚的中西比较研究更多关注专制主义及其历史地位。在《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中，他批评古希腊民主的原始性，认为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记录的制度不足以反映雅典民主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与之相反，先秦中国诸邦存在颇多民主元素。他力证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有其必然性，并对古代各国的专制主义政权加以系统评述，强调所谓的专制主义并不能够确立彻底的独裁，而受到法律、习俗、官僚机构、社会力量等多重因素制约。④ 在《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中，马克垚认同古代中国进行的是统一战争，与罗马那种由奴隶制驱动的扩张存在本质差异。⑤

张巍和黄洋等将中西比较研究视为中国最有可能对古典学作出贡献的领域之一。张巍更多立足本土，希望借助西方古典精神反观中华文化，引入文化批判精神，使西方古典学内化为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⑥ 黄洋批评西方学者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指出该体系对

① 参见刘家和：《传承和创新与历史和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第 58~66 页。

② 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10 页。

③ 参见刘家和、刘林海：《3—6 世纪中西历史及文明发展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第 73~99 页。

④ 参见马克垚：《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36、39~45 页。

⑤ 参见马克垚：《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11~213 页。

⑥ 参见张巍：《中国 – 希腊比较研究综论》，张巍主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指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56~57 页。

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解释是从现代西方文明立场出发的。因此，他呼吁在深入开展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古代文明为参照系理解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除了中西比较，他还号召将古代西亚、埃及、印度等纳入比较视野，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①

在一些具体领域，学者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早在 2009 年，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就已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六书用于解读西亚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不仅提出汉字“新六书”理论，将传统六书改造为象物、象事、转义、会意、谐声、形声，而且根据楔形文字和汉字的造字理念，指出原始楔形文字的结构类型至少有十二种（十二书）。这既为解释中国文字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又成功运用中国传统造字理论阐释了楔形文字的部分特点。他们还就文字与文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文字与国家都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新事物……但二者不构成因果关系……国家标志着一种社会发展阶段，文字虽然亦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不一定与国家的形成完全同步。”② 在《苏美尔文明》中，拱玉书进一步发展了其以六书阐释楔形文字的理论。他发现楔形文字可能是在短时间内由一位或一组文化精英发明创造的，并非长期演化的结果；最早的楔形文字都是表意字，一个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要素，后来陆续出现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他还明确指出，传统认为的象形文字—音节文字—字母文字的进化顺序并不科学：“这三种文字类型没有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别，它们都是为适应各自所表达的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取代关系，也不是晋级关系，而是互不干扰、平行发展的关系……某种文字体系的终结往往不是文字本身的原因。”③ 这一独到见解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公允地评价不同文字的功能，而且对研究文字与国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杨建华通过比较苏美尔与中国的文明起源，凸显了社会组织变化在早期文明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她注意到：“农业每一次发生重大飞跃之后，都将出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过程，是经过多少代

① 参见黄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意义与路径》，张巍主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指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244、257~260 页。

② 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序言”，第 iv 页。

③ 拱玉书：《苏美尔文明》，译林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510 页。

的努力才能实现的，而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所引起的社会组织变革则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因而在文明产生前夜，社会组织的变革是剧烈的、明显的。在两河流域，灌溉网络的形成和冶金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早王朝以后，这进一步说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① 她还提出，在两河流域，神权早于军权出现，掌握军权者的地位直到早王朝Ⅱ期才有较大提升；而在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中，神权与军权结合得很紧密，军事活动对社会分层与权力集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②

此外，在中西国家治理模式、边疆政策、军事战略思想、族群认同、哲学思想与科学思维发展，以及居延汉简与文都兰达木牍比较等领域，学者们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③

三、结语

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产生的重要成果。如果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尚处于草创阶段，主要任务是运用古典世界的资料验证奴隶制和奴隶社会理论，相关教育仍分散在不同学科，那么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在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和跨学科特点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与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思考相联系。在比较研究中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部分中国学者在中外古史比较领域用功至勤，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理论与方法上，中国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于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阐释古典世界的历史，关注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奴隶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探究古代社会的结构及其与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成就的同时，始终具有相当鲜明的中国特色。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9 页。

② 参见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10 页。

③ 参见晏绍祥：《中国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1949—2020）》，张巍主编：《古代文明比较研究指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315~337 页。